

共匪「教育革命」的前因後果

汪學文

一 共匪「教育革命」的基本原因

共匪的所謂「教育革命」，不僅具有全面性，而且具有持續性，以致大陸教育二十餘年來始終不穩定，沒有建立制度。

共匪之所以不斷地進行「教育革命」，一方面是由於政治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毛魯澤東的教育路線和主張，不斷受到抵制，始終沒有實現：

1. 政治的影響——共匪一向主張教育要服從於政治，教育要為政治服務，因而其教育往往受到政治的影響，而不得不改弦更張，「破舊立新」，例如：

(1) 共匪竊據大陸初期，因為實行「一邊倒」政策，教育改革於是走上俄化的道路。在強調「學習蘇聯經驗」的口號下，截至民國四十六年上半年，蘇俄派到大陸担任教改及教學者，計達七千名之多，共匪謬譯蘇俄高等學校教科書，則有一千三百九十三種，以致共匪在「文革」期間亦自認當時乃是「照搬了蘇修的一套」，削足適履，格格不入。

(2) 共匪於民國四十七年實行「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政策，於是教育上也來一次「大躍進」。四十七年九月，匪黨中央與偽「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規定各省市匪黨黨委及匪偽政權，有權對新學制進行典型試驗，以便取得經驗後，在全大陸推行，於是掀起「全黨全民辦學運動」、實行「教育大躍進」，認為教育不是專家的專業，誰都可以辦。

上項「指示」又規定「一切學校須將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於是大陸各地又試辦半工（農）半讀的學校，如「耕讀小學」、「農業中學」和「勞動大學」等，加強生產勞動，並認為辦什麼樣的學校都可以，不一定要力求正規。同時，在這項「指示」中，更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共匪「教育革命」的前因後果

的口號，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這項「指示」不僅是一次新的「教育革命」，而且使大陸的教育，從俄化的道路轉向毛化的道路。

對於這次「教育革命」，陸匪定一會於五十年指其「亂、糟、偏」；又於五十一年七月十日在匪黨中央宣傳部談「普教工作十三年總結」時加以批評，謂「學生程度每況愈下，比不上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代好的學校，主要原因是領導不堅定，誰說什麼就改什麼，下面反映程度高了就砍，減了還是有意見，不滿意，似乎提高一點深一點就是不行。」（註一）

(3) 共匪於五十五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於是教學改革就成為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五十五年八月，匪黨中央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其中第十條即指出：「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並且強調「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2. 路線的鬥爭——在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的十七年中，大陸教育戰線，據說同政治戰線、經濟戰線一樣，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尖銳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毛魯澤東制定了一條「社會主義教育路線」，而劉少奇却推行一條「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彼此針鋒相對，鬥爭不已。（註二）同時，大陸教育界反毛人士亦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走自己的教育路線，以抗拒毛魯的教育路線。例如：

(1) 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上的鬥爭，不僅是尖銳的，而且是長期的。就其本質和焦點而言，主要的不外下列諸問題的論爭：

(甲) 教育方針上的「革命化」和「現代化」的問題——毛派力主以「老解放區」（按指延安）的「革命化的教育新經驗」為基礎，改革舊教育，為鞏固其偽政權而服務；劉派則認為「抗大式的學校是訓練班性質，過時了」，於是提倡「現代化教育」，亦即「全盤俄化」的教育；

(乙)教育任務上的「政治第一」和「智育第一」的問題——毛派認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因而強調教育必須「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劉派則認為教育就是「傳授知識」、「學習知識」，因此提倡「智育第一」；

(丙)教育制度上的「半工半讀制」和「兩種教育制度」的問題——毛派一向主張「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劉派則主張辦兩類學校，第一類學校基本上是整天讀書，第二類學校則把學生參加勞動、解決教育經費、賺錢、訓練勞動動力，列為自己的主要目標。(註三)

(丁)教育行政上的「外行領導」和「內行領導」的問題——毛派主張教育要「由黨領導」、「由工人階級領導」，此即實行「外行領導內行」的政策；劉派則認為「黨不能領導技術」、「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陸定一甚至提出學校「非要同資產階級合作不可」等主張。(註四)

(2)在「文革」前，匪偽高等學校校長亦紛紛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以抵制毛酋的教育方針與政策。茲將有代表性的教育主張列述如下：

(甲)偽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的教育主張：

a、在教育方針方面，主張「學習蘇聯、參考英美」、「繼承老北大」，「以莫斯科大學為學習目標」。

b、在教學內容方面，完全排斥毛酋思想，主張「厚古薄今」、「多而精」，對於西方學術則要向學生「作比較全面、如實的介紹」。

c、在生產勞動方面，認為半工半讀妨礙「以教學為主」的原則，影響學生系統基礎理論上的訓練，因而主張把學生生產勞動時間壓縮到最低限度，每年平均不超過一個月，教師則以半個月為限，均不必下廠下鄉。

d、在階級路線方面，贊成「重在表現」的政策，反對工農學生享受「特權」，「學不好，就退學」。

e、在培養「接班人」方面，主張「業務掛帥」，實行「天才教育」。並訂定「師資培養辦法」，實行嚴密的等級制度。(註五)

(乙)偽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的教育主張：

a、「四個第一」——科學研究成果第一、學者權威第一、學習成績第一、物質條件第一。

b、「書院制度」——表示要將偽南京大學溧陽分校辦成書院式的學校

c、「教授治校」——設立學報委員會，並擴大其權力，以抵制匪黨在學校中的領導作用，逐步建立「教授治校」制度。

d、「紅專三七開」——主張將十分之七的精力用在學習上，用在業務上，主張「書本為主」、「間接知識為主」。

e、「合二為一」——強調搞好「師生關係」、「青老關係」；主張工農階級學生要與地富階級學生交朋友，實行「合二為一」。(註六)

(丙)偽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的教育主張：

共匪指李達以「老革命、老黨員」自居，以「馬克思哲學權威」作招牌

，進行反共反毛活動，是個「雙料貨的人物」，必須「鬥臭、鬥垮、鬥倒」，因而批判了再批判，並作人身攻擊。而在教育方面，共匪所列的罪狀為：

a、攻擊匪黨的無產階級教育方針；

b、反對「教學革命運動」；

c、反對匪黨的領導；

d、在偽武漢大學實行資產階級「教授治校」的路線；

e、排斥、打擊工農出身的匪幹和左派學生。(註七)

從這些「罪狀」中，我們不難看出李達的教育主張，亦是以「民主治校」、「自由講學」為中心。

毛酋的教育路線和主張，既然一方面受到劉少奇派有計劃的抵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教育工作實際負責人普遍的抗拒，以致始終沒有實現。

二 共匪教育在文革中的重大改革

共匪在文革初期，首先宣佈廢除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並強調要把「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脫離三大革命運動」的、「宣揚剝削階級世界觀」的「一切舊教材」，統統「埋葬」；接着在「文革十六條」中規定「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

茲就共匪數年來在教育上進行的重大改革，列述如次：

(一)縮短學制——大陸學制之縮短，目前大致如此：小學由六年縮短為五年，中學由六年縮短為四年，大學原為五年，現理工科縮短為二至三年，

文科縮短爲一至二年，並廢除研究生制。因此，以就學年限言，總計較大陸原有學制約縮短一半；而就教學內容言，由於全日制一律改爲半日制或半工半讀制，勢必再打折扣。

(二)改變體制——在教育體制方面，共匪試行的方案比較多，歸納起來約包括下列諸項：

1. 實行軍事編組——共匪各級學校，大致已普遍實行軍事編組，惟方式並不一致，例如：

(1) 僞同濟大學試行的方案，是廢除學系和教研室，設置若干「專業委員會」，由學校、生產單位、和設計單位的人員共同組成。「專業委員會」之下設置若干「教學班」，其中有教師、學生、工人、工程技術人員，並進行軍事編組。(註八)

(2) 僞北京林學院試行的方案，是將原來的各系教研室取銷，按專業組成三結合的「專業連隊」，把以前按年級研究教學改爲按專業研究教學。(同註八)

(3) 僞山東醫學院試行的方案，是讓教師到學生中去，按照「連隊編制」建立師生結合在一起的「教學小組」。(註九)

(4) 僞北京白家莊中學試行的方案，是取銷教研組，按年級建立「連委會」，統一領導學校的「鬥、批、改」和「復課鬧革命」。(註一〇)

(5) 僞天津延安中學試行的方案，是取銷教研組，採取「兩三個教師包一個班」的辦法，「使教師以一個普通士兵的身份出現在學生之中，像解放軍連隊幹部一樣，和同學們同革命、同學習、同勞動」。(註一一)

以上這些關於教學體制的改革，計有兩大特點：

一爲取消「教研室(組)」和科系班級。「教研室(組)」乃是以「結合教師、集體備課、推動教學」爲名，而實際控制教學計劃、教材內容、以及教師生活的組織，但因其爲蘇俄制度，且在大陸實施以來，由於運用欠當，其中「單幹風」頗盛，未能發揮控制作用，所以各方案均主張取消；

二爲建立教師「跟班教學」制度。「教研室(組)」係按學科劃分，「教學小組(班)」則以班級爲單位。前者雖具控制教師作用，其活動似偏重於教學研究與實施，後者則係按軍事制度實行師生混合編組，企圖透過師生互相監督的方式，一併加以嚴密控制。

共匪「教育革命」的前因後果

2. 建立政工部門——僞同濟大學的方案，主張建立政治工作部門，各專業委員會設政治指導員，各班配備政治幹事。僞天津延安中學的方案，則「以解放軍爲榜樣，建立了政治處、文教處、後勤處」。(同註一一)

(三)廢除考試——文革初期，共匪即廢除升學考試制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方法，其步驟有四：

1. 自願報名：但以工農階級爲限；

2. 羣衆推薦：這祇是一種形式和手法；

3. 領導批准：這是一個關鍵，透過這一關始可入學；

4. 學校複查：目的在加強領導審核。

後來，匪「人民日報」又于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公佈「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規定：打破入學年齡的限制，廢除舊的考試、留級制度；允許所謂政治思想好、學業成績優良的學生「跳級」(第十四條)。

(四)精減課程——共匪「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關於課程的規定是：

1. 小學設五門課，即「政治語文課」、「算術課」、「革命文藝課」、「軍事體育課」和「勞動課」。(第二十四條)

2. 中學設五門課，即「毛澤東思想教育課(包括有中國近代史、現代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農業基礎課(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地理)」、「革命文藝課(包括語文)」、「軍事體育課(包括學習毛酋的人民戰爭思想、加強戰備觀念、和開展軍事體育活動)」、和「勞動課」。(同前)

至於大學課程的調整，各校鮮有具體的方案。僞復旦大學的「毛宣隊」，曾提出課程設置的原則，和科系精簡的方向。在課程方面，它主張「整個教學工作必須以毛××的『五、七』指示爲綱，以毛××著作爲基本教材，以階級鬥爭爲主課。學生『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可以通過自辦工廠、廠校、社校掛鉤等方式，建立文、理科的教學實踐基點，使學生定期參加實踐」。

在科系方面，該校雖未廢除，但却主張更改和歸併。它認爲「現在的綜合大學的體制脫離三大革命的需要，重疊煩瑣，必須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分別進行精簡，合併，或者增設。如生物系過去不爲農業生產服務，不研究馬、牛、羊、棉、油、糧，盡鑽『牛角尖』，可以把有

關專業併入農學院、林學院、醫學院。有些系，如新聞系，根本培養不出革命的戰鬥的新聞工作者，可以不辦。」（註一二）

從這兩項主張看來，該校課程顯有大量減少，而其他高等學校，亦大致如此。

（五）改編教材——共匪對於教材的改編，也是按照「破舊立新」的教條去進行。首先是展開所謂「革命大批判」，把劉匪少奇「利用舊教材、吹捧剝削階級、灌輸封、資、修毒素」的罪行，一一列舉出來，加以批判清算。然後再紛紛成立以工農為主體、有匪幹和「革命師生」參加的三結合的「教材編寫小組」，從事「新教材」的編輯工作。

不過，教材編輯工作，因為必須要將「毛澤東思想」滲入教材之中，其進行至為遲緩，於是很多學校祇得「邊教邊編、邊教邊改」。有的學校由于原有教材大都否定廢棄，毛澤東著作幾已代替一切。例如偽同濟大學師生員工，每天清晨背誦「老三篇」，每天上午學習毛著著作兩小時，「已經成為全校固定不變的制度」。（註一三）偽天津延安中學亦以毛著著作為基本教材。政治課、語文課都講毛著著作。外語課學習毛語錄，以及「戰時所需的對敵喊話」等。一般知識課也都突出毛著思想。（註一四）又如偽北京石景山中學，它是一個有一千餘師生的初級中學，全校組織了一百一十五個學習毛著著作小組，「每天堅持一小時雷打不動的學習制度」。（註一五）

（六）實行工管——五十六年三月七日，毛澤東發出所謂「三七指示」，規定「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門、批、改的工作」。於是大批匪軍紛紛進駐各級學校，以實施「軍訓」為名，整頓「紅衛兵」，並對學校實行「軍管」。

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共匪又派所謂「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先進駐正在展開激烈武鬥的偽清華大學；隨後大批工人在匪軍部隊的保護下，紛紛進駐其他高等院校，而大陸各地各級學校亦展開同樣的活動和措施，皆以進行「宣傳」為名，鎮壓「紅衛兵」，並對學校實行「工管」。

共匪對各級學校實行「工管」，一方面是要衝擊學校、改革教育，以「結束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另一方面則要貶低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地位，共匪始終認為青年學生及知識份子均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架子，

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共匪「人民日報」為一篇題為「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所寫的編者按語，即曾「奉勸那些輕視工農、自己以為很了不起的大學生放下架子，迅速趕上億萬革命人民前進的雄偉步伐」。這次工人進駐學校，統治學生，就是要進一步去「扯下」大學師生的「架子」，進一步侮辱和迫害知識份子。

三 當前共匪在「教改」上的退却措施

由上可知，共匪在「文革」初期，即廢除入學考試，旋則縮短學制、精減課程、改編教材，並結束知識份子治校之傳統，企圖澈底推翻原有教育制度，依照毛著「三七指示」重新建立一套教育制度。

但是，近年來，共匪的教育改革工作，始終是「破」多「立」少，甚至有「破」無「立」，例如很多學校遲遲不能編出新教材，以致造成一片混亂現象。共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乃不得不逐漸採取退却措施，走回頭路。

茲根據共匪透露之資料，將其退却措施簡述如下：

（一）起用老教師——共匪復課之初，對於原有教師即採取「邊改造、邊使用」政策，但起用者不多，月來繼續強調要重新起用老教師者約有下列諸地區：

1. 匪湖北「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二日報導：武昌和平區中小學教師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從事教育工作達十年以上，他們有一定的教育工作經驗，是教師隊伍中一支重要力量，在工作上應對他們作合理安排、大胆使用，對于一向表現好，又有一定工作的老教師，安排他們擔任教研組長等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

2. 匪江蘇「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三日報導：匪黨鹽城縣勸南公社黨委，在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過程中，開展以老帶新活動，組織新老教師共同鑽研教材，商討教學方法，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並且由水準較高、經驗豐富的教師編寫教學提綱，供新教師備課時參考。

3. 匪江蘇「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五日報導：揚州中學匪黨支部和偽革委會根據老教師的具體情況和特長，合理安排了他們的工作，有的老教師担

任了教研組長，有的被推選到學校的有關領導崗位，凡是召開有關「教育革命」的會議，都請老教師參加，傾聽他們的意見，充份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

4. 匪湖南「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一日報導：衡山縣第四中學匪黨支部，認真做好老教師的工作，充分調動他們的「革命積極性」，發揮他們的技術專長，推動了「教育革命」的深入發展。

5. 匪「人民日報」七月八日發表「借做其他工作的教師應當迅速歸隊」一文，強調各級匪偽黨組織和革委會，應把借用做其他工作的教師調回學校工作；已改做其他工作但仍適合當教師的也盡量調回。

(二) 要求教師提高教學質量——匪福建「人民廣播電台」五月三十日報導：偽福建省霞浦縣第三中學要求教師「保證有充分的備課時間，訂出在基本上能看出較為詳細的教學方案」。對於學生的作業，要求教師「嚴格檢查、批改」。

匪「人民日報」七月八日曾載文強調要給教師充分備課和教研活動的時間，並提高民辦教師的政治和業務水準。該報並加編者按語說：「有些學校的領導對教師的備課和教學研究不夠重視，沒有給教師安排足夠的備課和教研活動時間；有些學校雖然給教師安排了備課時間，但經常被其他活動擠掉，影響了教師業務水平和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希望各地有關部門採取必要措施，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三) 要求學生認真學習——匪「人民日報」於七月六日曾發表兩篇要求學生認真學習的文章：

1. 匪偽廣東省茂名市紅旗小學去（六十）年以來，着力抓後進學生的轉化工作，全校二百七十四名後進的學生，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二百二十八名跟上了隊，其中二十名的學習成績達到上等水準，三十六名參加了「紅衛兵」或「紅小兵」。

2. 匪偽長沙市清水小學的學生，有「調皮大王」，在外面打架的；有上課打瞌睡，學習成績差的；有上課時畫豬、畫鴨、畫汽車的。現該校對成績較差的同學則採用課前或課後個別輔導和建立學習小組，開展「小先生」活動的辦法，做到缺課及時補，不懂及時講解，以避免問題成堆或跟不上班的現象。

(四) 要求匪幹認真督導教學——共匪最近對各校黨支部和革委會的要求亦

共匪「教育革命」的前因後果

漸次趨嚴，以加強教學的督導工作，例如：

1. 匪浙江「人民廣播電台」五月二十七日報導：匪偽寧波市教育局人員和該市許多中小學的匪黨組織的正副書記，今（六十一）年以來，「積極深入教學第一線」，加強對教學工作的領導，參加教研活動。該市有的學校還「精簡了會議，妥善安排政治活動時間，使教師有一定的自修時間」，有的學校「減少了非教學人員，加強了教學第一線的力量」。

2. 匪陝西「人民廣播電台」六月六日報導：匪偽陝西省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學革委會規定其委員要參加聽課，負責檢查教學質量。

(五) 提高文化課教學質量——共匪原重政治課，忽視文化課，近則對文化課亦漸予重視：

1. 匪福建「人民廣播電台」五月三十日報導：匪偽福建省霞浦縣第三中學具體規定「保證有百分之七十的時間上文化課，不以任何活動隨意代替文化課的學習，各課程都要有充分具體的教學計劃，保質、保量的按學期完成教學任務」；該台六月一日又報導：匪偽福州市實驗小學規定要「保證以百分之八十的時間，上好文化課」。

2. 匪江蘇「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三日報導：匪偽清江市向陽小學革委會，注意幫助教師在教學中正確貫徹執行理論和實際統一原則，提高社會主義文化課的質量。

3. 匪浙江「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三日報導：偽寧波市第二中學匪黨支部領導成員，深入教學第一線，切實加強領導，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文化課教學質量。

(六) 訂立考試、升留級制度——共匪在「文革」初期，不僅廢除考試制度，而且廢除留級制度，近則將這些制度漸次恢復：

1. 據匪「新華社」六月十四日報導：匪偽天津市延安中學不但恢復了考試制度，還建立了「必要的升留級制度」。

2. 匪浙江「人民廣播電台」七月十三日報導：匪偽寧波市第二中學為了促進「教育革命」的發展，已開始對學生實行考核、考試、補課等制度。

由上可見，共匪在「教育革命」上已普遍採取退却政策，這種政策上的轉變，乃是「文革」以來共匪全力推行毛魯教育路線的破產的反映。

共匪對於原有教師一向視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必須加以改造和再教育

，如今雖然尚未改造完成，却不得不「一邊改造、一邊使用」；共匪一向忽視文化知識課程，甚至以政治課程取代，如今却不得不不予重視；毛曾澤東曾經指責「考試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的方法」，表示「不贊成」，如今却逐漸恢復考試制度；共匪曾指「教研室（組）」是「修正主義的東西」，要予廢除，如今却普遍恢復。這種政策上的左右搖擺，實使教師和學生都難以捉摸，無從適應，因而教師對此退却政策多持觀望態度，學生退學者亦不少，預料其在教育領域中可能又造成另一型態的混亂，未必能達到共匪所預期的效果。

四 共匪「教育革命」的主要影響

共匪「教育革命」的影響，不僅很廣泛，而且很深遠，對共匪本身來說，未免也得不得償失，甚至有失無得。毛曾澤東曾強調要「破三套」（孔子一套、杜威一套、蘇聯一套）、「立一套」（毛曾自己的一套），如今「三套」大致已遭摧毀，毛曾的一套却並未建立。

共匪「教育革命」的主要影響，就共匪本身而言，可分為兩方面，即有形的影響和無形的影響：

在有形的影響方面，就共匪高等學校來說，自民國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四年未曾招生，每年招生以二十萬人計（四十九年招生二十一萬人），至少少培養大學生八十萬人。在大陸五百餘所高等學校中，如今恢復招生者約為二百餘所，而各校新招學生數目又較前為少，因此結算總賬，共匪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當已少培養一百多萬大學生。五十七年六月七日莫斯科廣播電台曾經以華語指出：「自從臭名遠揚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你們（中共）在兩年中至少少培養了七萬名工程師、五萬名教師、兩萬五千名醫生、和數萬名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專家」。這些數字，如今起碼應該加倍計算。

在無形的影響方面，主要的是使學生喪失進取精神，使教師喪失專業精神。

學生由於缺乏進取精神，其被選拔推入學者，竟有紛紛退學的情事發生，因此共匪報刊最近一再強調要做好學生的「鞏固工作」。據說，山西省平順縣六十年入學兒童讀完小學五年的祇有百分之七十三（註一六）；河北

省安次縣匪南尖塔公社一生產大隊到社辦中學上學的原有四十多名學生，可是不到半年，先後有三十多名學生退了學，「有的是受了『讀書無用論』的影響而自己退學的，有的是因為上學校不能生產勞動，增加了家庭負擔。」（註一七）

教師由於缺乏專業精神，大都處於「推一推、動一動」的地位，甚至紛紛改行。例如有的教師說：「當教師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辛辛苦苦却犯了錯誤。」（註一八）因而一心想「改行」了事。這段話，和大陸流行的「教書倒霉論」，都是今日大陸教師的血淚的哀嘆和悲鳴！教師缺乏專業精神，學生缺乏進取精神，必將進而影響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預料共匪將自食此惡果。

註一 引自「十七年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原載匪偽「北京市教育革命聯絡委員會」五十六年五月六日出版之「教育革命」第四期。

註二 參見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三 引自「戳穿兩種教育制度的反動本質」一文，見五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四 引自「徹底粉碎陸定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一文，見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共匪「光明日報」及八月十八日共匪「中國青年報」。

註五 見五十五年七月九日共匪「光明日報」及八月十八日共匪「中國青年報」。

註六 見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七 見五十五年九月五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八 見五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九 見五十六年十一月四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〇 見五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一 見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二 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三 見五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四 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五 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六 見六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七 見六十年十月六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一八 見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共匪「光明日報」。